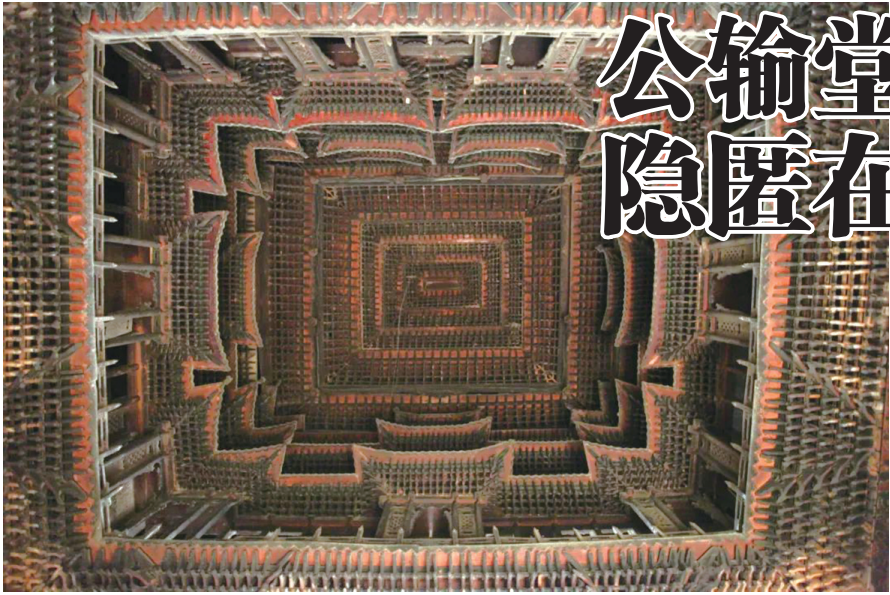




充分彰显中国古建纷繁复杂之美的公输堂天宫楼阁。

4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最后一天,中法联合发表声明,其中指出“重启人文交流”,中法两国承诺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和开发领域的双边合作,两国欢迎就中国专家和法国团队共同参与巴黎圣母院现场修复工作、兵马俑保护修复研究合作、公输堂和茂陵合作项目、推动两国世界遗产缔结友好关系等达成文化遗产合作路线图。

相比巴黎圣母院、兵马俑、茂陵3处文化遗产,公输堂鲜为人知。随着声明发表,这一隐匿在关中乡间的国宝殿堂再次进入人们视线,仅是网络上流传的数张有关公输堂内天宫楼阁的图片就足以令人震撼。

走近天宫楼阁

公输堂也叫源远堂,位于西安鄠邑区渭丰街道祁村南堡中部,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是民间“白阳三会”教为纪念其教主而建造,历时11年建成,堂内供奉有100余尊佛像,当地人又称其为“万佛堂”。

公输堂坐北朝南,原有建筑照壁、山门、头、中、后三进殿各3间,另外还有客房五间,是一处功能齐全的建筑群(群)。现仅存公输堂大殿,大殿建筑面阔3间、进深2间,硬山顶,建筑面积106平方米、进深11.3米,面宽9.4米。屋面覆以灰陶瓦,檐下不施斗拱。公输堂大殿内原来保存小木作3间,目前仅存明间和东次间,西面次间的穿堂连带上部的天宫楼阁及佛道帐均已倒塌,损失计有穿堂3间,佛道帐9间及相应上部的天宫楼阁。西面次间倒塌后,为了安全和保护现存建筑,已经在西次间与明间处砌起一道砖墙。

天宫楼阁的小木作全部由榫卯结构相连接,楼楼并列,层层相接,檐部由上万件

斗拱组合而成,既坚固又轻巧,整体性好,不易变形,是体现《营造法式》中关于天宫楼阁形制的典范之作。

(何为小木作?中国古代建筑以来按木工工艺的不同,把建造房屋木构架的叫作“大木作”;把建筑装修和木制家具的叫作“小木作”。小木作又称装修,可分为外檐装修和内檐装修。前者在室外,如走廊的栏杆,屋檐下的挂落和对外的门窗等,后者装在室内,如各种隔断,罩、天花、藻井等。)

已故古建筑学家单士元先生曾在考察公输堂后表示:“公输堂无论就其历史价值还是工艺价值来讲都够得上国宝级别。宋代书籍《营造法式》上有关于天宫楼阁的文字介绍,可惜的是它只有‘法式’文字图样而无实物模型。公输堂的发现,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实物,弥补了这一缺憾。公输堂不是属于工艺品之类的小玩艺,它是大型完整的科学的东西,这在国内是唯一的、绝无仅有的,是体现1000多年前《营造法式》中天宫楼阁的孤品实物。公输堂不仅雕工精细,彩绘也有非常高的价值,用的是矿物颜料,保持了约600年不褪色,有的小沥粉彩绘和工楷小字一样,一笔一点,一丝不苟,非精工巧匠不行。”

暗藏话语炫技巧

在公输堂东阁门有对联“法堂巍巍雕刻若得公输巧,圣像翼翼彩绘似有道子能”,“道子”指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而“公输”则是大名鼎鼎的工匠祖师爷——公输班(鲁班),故当地人也将公输堂称为“鲁班堂”。

曾有维修人员发现公输堂暗处藏留言:“强我者增三件,差我者减一半。”意思是技艺比他们强的工匠如果拆了公输堂,安装的时候会多出3块木头无法安置;而技法不够高超的工匠如果敢挑战

的话,就会剩下一半的木头无法安装,根本恢复不了原样。公输堂建造技法的高超可见一斑。

公输堂里面共有8块镂空板门,上半部均由各种不同形状的花朵组成,花心原均镶有明珠,犹如满天繁星,更增添天宫楼阁的豪华景象与神秘色彩。每朵花都称得上雕刻艺术珍品,一个很小的套锁梅花竟由24件形态各异的更小花瓣组成,没有使用任何黏合剂,全部都是镶嵌穿锁而成,严丝合缝,精巧至极。

此外,公输堂的油漆是用“紫龙罩”工艺,彩绘用“卧金点翠”法。公输堂小木作表层遍布彩绘,梁枋柱架及穿堂抱框等位置,均采用建筑彩绘式样,这既是对建筑物的木构件进行美化装饰,又起到了防腐防虫的作用。由于彩绘用沥粉贴金,立体感强,五彩辉煌,变化多端,幻若仙境,且经久不褪,保留至今。

开启高规格合作

陕西文物保护人员经过细致调查后发现小木作目前病害主要包括腐朽、虫蛀、木构件断裂、缺失、颜料层脱落、灰尘覆盖等问题,再加上公输堂建筑东、西、北三面地势均已抬高,使得公输堂整体地势陷于低凹处,木构建筑常年处于潮湿状态,需要科学保护。

近年来,陕西省文物局开展了多项工作——

2016年,陕西省文物局与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在巴黎卢浮宫图书馆签署了《关于陕西省文物局与法国遗产科学基金会合作备忘录》,明确双方将积极开展人员交流和培训工作。法国遗产基金会派遣专家,到公输堂就彩绘木作的合作保护进行了现场调研,并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达成合作研究意向。

2017年12月,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与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签署关于开展“公输堂彩绘木作保护研究”合作协议书,该项目被列入中法第四次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2018年,法国先后有五位专家到公输堂,与中方项目组成员一起,现场开展彩画病害、材料老化、木结构、木材种类、树龄考古测定等方法研究。

2019年5月,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与法国国家遗产学院签署“中法合作公输堂古建油饰彩画保护培训班”框架协议。

目前,中法合作公输堂古建油饰彩画

保护项目,已在彩画颜料老化试验研究、树轮年代学、木材种类研究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此次中法联合声明“重启人文交流”无疑再次开启了公输堂的保护修复工作,相信在中法两国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公输堂将更加绽放光彩。 □杨利娜



“似有道子能”彩绘。



公输堂里的雕刻艺术。



西安大雁塔东侧的青龙寺,始建于隋朝初年,一度称之为灵感寺,后改为青龙寺,是中国佛教密宗的根本道场。据有关资料记载,青龙寺历史上先后有两次被毁,其中在明万历年间寺院废毁,建筑物荡然无存,殿宇遗址被掩埋地下。考古研究人员根据保存下来的古代木塔塔基遗址和殿堂墙柱遗址测算,青龙寺寺院古建筑似为面宽五间、进深四间的庞大建筑群落。

青龙寺自建成到现在,经历了千余年的漫长历史,它作为佛教密宗祖庭,在中国宗教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中外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青龙寺是唐朝密宗高僧惠果长期驻锡之地。惠果法师是继不空大法师之后的密宗传法阿闍黎(高僧),幼年时期跟随不空法师弟子贞贞研习经书,深得感悟,受到不空大法师的赏识,年仅20岁时在大慈恩寺接受具足戒后,又被传授金刚法和胎藏法,并提出“两部一具、金胎不二”的修法传法理念,他将两部佛经融为一体,为弘扬佛教密宗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作为唐朝代宗、德宗、顺宗皇帝的三朝国师,还经常应诏在道场为皇室成员修法,倍受皇室和佛教界的尊崇。

其二,在唐朝兴盛时期,朝廷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来长安学习佛教文化的域外僧人越来越多,使青龙寺的影响与日俱增。九世纪初期至中叶,来自日本、新罗(今朝鲜、韩国)、阿陵国(今印尼爪哇岛)等国僧人纷纷来到青龙寺,学习佛教文化,研究密宗秘籍。尤其是日本僧人来长安求法者甚多,有“入唐八大家”之说,最为突出的是空海法师,他从日本大阪出发,在海上航行三十多天后,从福建长溪赤岸登陆,途经杭州、洛阳等地到达长安。入住青龙寺后,师从密宗惠果法师,深得中国佛教密宗真传,惠果阿闍黎予以传法灌顶,授为八代祖。空海在长安居住时间不长,但他遍访名胜古寺,广交贤达,潜心学习佛教文化,坚持钻研汉语,在佛经、梵文、文学和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他回到日本后,创立了日本密宗(又称东密)真言宗,成为东密之祖。他撰写了《篆隶万象名义》《文镜秘府论》,前者是日本第一部汉字典典,后者则重在介绍中国文学书画知识,对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设立道场,弘扬佛教密宗,成为开创东密的一代佛学大师。

其三,青龙寺的文化影响,不仅在于它是中国佛教密宗祖庭,而且也是日本密宗真言宗的祖庭,在日本人心中心它是一座圣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日两国政府在青龙寺建立空海纪念碑,建立惠果大师和空海法师纪念馆,纪念这两位高僧对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寄托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的愿景。

青龙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深远影响,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1986年,青龙寺从日本引进了10多个品种,共计千余株樱花树栽植于寺院内。每年春季,青龙寺内樱花盛开,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每天都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驻足拍照留念,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姚增战

武功插酥

秦 味

武功插酥可真不好找,听人说,须得到武功老城才行。等到了此地才知道,老城里面做插酥的也没几家,而且是早餐,午饭后基本就没了。

武功插酥做得最好的一家在县城南街口,人称老段。段家人从事插酥买卖始于何时,已难知晓,据说民国34年时,武功镇(武功老县城)的段氏两兄弟,继承了家传插酥的营生,父亲将遗产的两个核心给了兄弟俩。老段拥有牌匾,老二拥有秘方,弟兄俩精诚合作,经营着插酥店,生意也是红火兴隆。

武功镇原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自古马匹众多。因此,插酥也是用马油来做,但随着马匹的逐渐减少,段家的生意也受了影响。于是,老段改行,不再从事插酥生意。老二舍不得丢弃祖先留下来的手艺,为了振兴家业,于是改用猪油试验,从最初的干硬难嚼,经反复琢磨,他将猪板油研成油泥,再调以以精粉,终于改良了用马油做插酥的老传统,在武功镇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口味江湖。

因为武功老城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诞生地,所以当地百姓也把该食与他附会相连,编出一段故事来,说“插酥”一名的由来,是因为唐太宗赞其“一插就酥”,并且成为宫廷御食,后来也是作为唐代祭祀乾陵和神祀的供品,后传至武功民间,至今延存。

后查于网络,插酥属于半炸半烙制品,与回民制作牛肉饼很像,锅底的高温炮制着表皮,使其硬化酥脆,菜籽油则浸润着插酥,使其保持润泽橙黄,做好后,外面金皮包裹,口感极佳。

关于插酥的写法,在当地并不统一,有写成“馅酥”和“叉酥”的。其实,插酥就是大油饼,与千层饼类似,但却是烧饼的外形。武功插酥皮脆内酥、油而不腻,是当地百姓喜爱的一口早餐美味。 □张西昌



武功插酥。

崔田夫：陕北党内的“老掌柜”

人 物

利。崔田夫看到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威力,革命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

1933年春夏间,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陕北各地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开辟农村工作、创建红色苏区的战斗任务,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在陕北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崔田夫参与了陕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同年7月,在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书记。

在腥风血雨中,崔田夫扛起锄头,以打短工为名,到处寻找党内同志:他找到了搞武装的高朗亭,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派崔正甫在绥德南区的王家沟村筹建了红五支队;他设法找到了绥德、清涧地区党的负责人,指定由张家修、崔文运、张昭修三人主持中共绥清中心区委工作;他到佳县南区主持召开特委会议,重新部署了整建党、团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主持了绥、清党组织的整顿和重建工作,开辟了绥、清红色区域,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下,整顿了因战斗失败而人散枪埋的红一支队,交给北方局派回陕北的谢子长,恢复重建了这支武装……崔田夫主持陕北特委工作半年,在全体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安定、绥清、佳吴、神府各地开辟苏区的工作如火如荼,陕北革命迈向新的发展时期。

1934年夏,崔田夫的胞兄、中共绥德县委书记崔文运被敌人杀害,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也被抓捕坐牢。敌人设下圈套,逼他就范。在生离死别的考验面前,崔田夫部署好党的工作,抛下亲情,以党的事业为重,毅然前往天津向北方局汇报陕北革命斗争情况。经过艰苦努力,至1934年底,陕北地区成立党团县委各7个,红军游击支队22支,组建了红八十四师和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陕北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1935年2月,崔田夫被任命为西北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被同志们称为陕北共产党的“老掌柜”。

自掏腰包,请教水土保持良方

在革命战争年代,崔田夫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安排;在和平环境里,他仍然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待遇多少,只要有工作干就行,只要能为人民做事就好,更不会计较个人的升迁荣辱。

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年月,崔田夫曾较长时间搞过党政检查工作,和平时时期,又长期在纪律检查岗位上任职,对那些违反纪律、损害

群众利益的行为,素来深恶痛绝。1963年,一次回到家乡铁茄坪,崔田夫看到满川的枣树被砍得光光的,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堆满了被砍倒了的枣树,这让他十分恼火:这些枣树是陕北群众祖祖辈辈栽种的树种,对群众的生活大有帮助,这枣子一红了,人们就不怕饿肚子了。

经再三追查,原来是绥德县委在袁家砭召开全县现场会时,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做了《关于在袁家砭川水地里打枣树腾出农耕地的经验介绍》的讲话,导致几乎砍光了全县川地里的枣树。崔田夫急了,打电话给榆林地委,要地委来人处理这件事。地委副书记王怀仁来到绥德,严肃批评了打枣树的错误做法,并要求这位讲话的副书记当面承认错误,这件事才得以了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崔田夫时刻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和乡亲们的生活,关注着家乡的变化。1964年春荒之际,他到绥德南区他当年“闹红”的故地搞调查,考察了崔家湾、苏家窑、定仙塬、枣林坪、田家岔、义合等公社后发现,社员生活的困难程度远出乎他的想象。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崔田夫找到了症结,写成《关于解决农村特困户生活问题的报告》,分别上报了县、地、省相关部门,就解决农村中特别贫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绥德县民政局很快落实了相关措施,解了特困群众的燃眉之急。

1966年春天,崔田夫来到全国水土保持样板之一的绥德县韭园沟下蹲点。他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丝毫特殊照顾,不论在谁家吃饭,一定要放下饭钱和粮票。他到吴家畔视察,发现该队的水土保持工作具有典型性,于是把大队干部们请到队窑,自己掏钱准备了一顿炸酱饸饹,吃完饭后,他开始向队干部们详细了解吴家畔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经过整理和加工,向省上报了一份典型报告材料《关于广泛开展学习吴家畔水保经验的报告》,希望在全省宣传、推广该大队的经验,让更多的社队和群众受益。在绥德蹲点的一年时间里,经过与广大农民朋友的广泛接触,崔田夫从改善群众生活、发展集体经济的角度,提出了改变陕北山区落后面貌的一系列措施,并在防风治沙、造林种草、多种经营方面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

从参加革命那刻起,体恤民情,廉洁自律,是他的一贯作风。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在自

身过硬的前提下,崔田夫向来铁面无私,敢于碰硬,敢于为民作主,仗义执言,从不含糊。因此不论走到哪里,就会有找人找他“告状”“诉苦”。

农民出身的崔田夫,与农民有着天然的情感,自己除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外,时常关注着乡亲们生产生活。

刚直不阿的崔田夫,在“文革”中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就在崔田夫住院不久,周恩来总理听取时任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的胡炜处理陕西两派造反组织问题的汇报时,问到陕北的“老掌柜”和刘大嫂(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的情况。胡炜原本不知道陕北“老掌柜”是谁,问到这个“老掌柜”叫崔田夫,而且正在省人民医院住院,便亲自到医院来探望,还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探望了崔田夫后,胡炜向相关部门指示:一是要省人民医院全力救治崔老,二是他家里有什么困难尽量给予解决。胡炜的探望,在精神上给了崔田夫极大安慰。很快,省人民医院成立了专家组对崔田夫进行治疗,并由普通病房转到了高干病房,生活待遇一下提高了不少,女儿崔桦也从咸阳调回西安工作。神志清醒后的崔田夫,听到女儿调回的消息后并没有高兴,对提高自己在医院的待遇感到不安,用生气的语调断断续续地说:“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说完这句话,崔田夫再也不能开口说话。1978年11月17日10分,崔田夫的心脏停止跳动,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这是崔田夫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人民群众的生活,始终是他牵挂的心结,群众还填不饱肚子,他如何能咽得下富强粉?

崔田夫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穿着那身普普通通的干部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穿了多少年。他家里的陈设,没有一件是能拿出手的像样家具。一张办公桌,两只普通棕箱,两张木板床,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唯有哪一张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办公桌,或许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公家人或干部。他的工资,不是资助了烈士的家属,就是帮扶了困难的乡亲。他所到之处,贫困社队办学需要钱,战友家属困难需要钱,乡亲们揭不开锅需要钱,当年无私支援革命的群众需要钱……两手难挡四面风,尽管他是每月挣一百多块钱的大干部,也招架不住八面漏风的窟窿。

巍巍青山,铭刻先辈英名;浩浩岁月,沉淀英烈豪情。 □杨树贵